



红军在西吉的八次战斗（上）

西征战役是中共中央为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造成西北联合抗日新局面，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大战略部署。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命令，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7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作战。自红一师三团1936年9月14日进入西吉境域，到1936年10月28日红六军团翻越月亮山离开西吉，红军西征期间在西吉境域活动历时44天，活动轨迹遍及新营、吉强、沙沟、平峰、硝河、将合堡、兴隆镇等17个乡镇，活动范围覆盖2285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72.7%。在西吉境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八次战斗，有效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建立了红色政权，传播了革命火种，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的军事条件、物质准备和群众基础，为西征战役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范家沟战斗

1936年9月21日，敌马鸿宾部一个骑兵团从静宁出发向单家集方向进攻，预谋偷袭红三团驻葫芦河2031阵地（今兴隆镇范家沟村）。根据对敌情的侦察，红一师师长陈赓部署红三团提前在范家沟村设伏，做好打击敌人进

犯的战斗准备。21日上午11时许，敌马鸿宾部队行进至范家沟区域，待敌两个连的兵力进入红三团二、四连的伏击圈后，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战斗骤然打响。红军指战员占据有利地形，架起机关枪向敌骑兵猛烈扫射，向敌群奋力投掷手榴弹，一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战场硝烟弥漫，敌骑兵进攻队形被打乱，有的乱冲乱闯，有的掉下回窜。敌指挥官一边怒吼，一边用枪顶着逃回的敌军士兵回头迎战，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敌骑兵边打边冲，妄图冲破红军阵地，但冲在前面的都被打落马下，或死或伤。经过激烈阻击战，敌骑兵发起的三轮冲锋均被红军打散打乱，敌阵营人马乱作一团，溃不成军。红军指战员趁势冲出战壕追杀敌人，勇猛攻击敌人，红军指战员喊杀声震天，气势如虹。敌人见红军指战员势如破竹，英勇无畏，勒马掉头向静宁方向溃逃，红军在追击的过程中又打死打伤敌人多人，俘虏敌人76人，缴获战马多匹，缴获枪支80多支，打伤敌团长1名。此次战斗狠狠打击了马鸿宾骑兵的嚣张气焰，再也不敢随意骚扰红军。

夜袭静宁城

1936年9月24日，红军侦察得知，驻守静宁县城的敌人军纪散乱，扰民甚烦，防守松懈，士气低落。红三团报告师部同意，决定夜袭静宁城，给驻守静宁县城的马鸿宾骑兵团以有力打击，

使其不敢轻易出兵骚扰红军，以便更好控制西兰公路，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创造更为有利的军事条件和战略准备。红一师首长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决定由红一团在界石铺执行打援任务，由红三团和静宁县地方游击队配合执行夜袭静宁县城战斗任务，一方面增强战斗力量，另一方面锻炼提高游击队战斗力。指战员白天休息，养精蓄锐。晚上7时半，红三团指战员与静宁县地方游击队从兴隆镇、单家集开拔，迅疾行军奔袭静宁县城。由于防守之敌没有预料到红军会步行长途奔袭，因此警戒不严，防守松懈。红三团与静宁县地方游击队靠近静宁县城发起战斗后，许多敌人才从梦中惊醒，仓促提枪迎战，有的连衣服都没顾上穿，一时间敌阵营人喊马嘶，乱作一团。红三团指战员与静宁县地方游击队乘机勇猛冲击，喊杀冲天，震耳欲聋，威震敌胆。敌人且战且退，妄想依靠地形熟悉和红军缠斗。红三团与静宁县地方游击队趁势攻击，英勇冲杀，不给敌人喘息机会，连着打了两个速决战，打散了敌马鸿宾骑兵团的阻击，打死打伤俘敌甚多，战果颇丰。天亮前，红三团与静宁县地方游击队迅速撤出战斗，撤离静宁县城，并派出便衣侦察敌人动向，安排精干小分队殿后断敌掩护，大部队沿原路向北快速行进，25日约上午10时，红三团和静宁县地方游击队回到驻地。此次战斗共歼敌180多人，俘敌260多人，缴获战马35

匹和大批武器弹药。

西沟战斗

在国民党西北“剿总”严令下，1936年10月2日，为报复红三团与静宁县地方游击队夜袭静宁县城行动，国民党马鸿宾部一〇一旅三〇一团由静宁方向出发，沿葫芦河北上，气势汹汹向单家集、兴隆镇进犯。敌部行至兴隆镇下范村后，其左翼一个营向范家沟进攻；其右翼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在三架飞机的掩护下经玉桥村向单家集进攻。当国民党左翼部队到达西沟（今兴隆镇南南村西河组）。因村庄内有一大水沟，原叫西沟）接近红三团1909阵地时，红三团参谋长陈英率领二、三连迂回到三个堡，团主力部队则由兴隆镇出发，迅疾行军至高家城、公易堂占据有利地形，对来犯之敌形成三面钳形夹击之势。敌人妄想借助飞机侦察扫射压制红军，冲破红军阵地，打败红军。但红军指战员沉着冷静，待敌进入前沿阵地后，迅猛发起战斗，机关枪、步枪、手榴弹齐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难辨东西，只得边后退边寻找掩护还击。红二、三连指战员抓住战机，居高临下发起冲锋，喊杀声此起彼伏，在与敌激战半小时后，打死打伤敌80多人。进犯之敌见红军指战员作战勇猛，火力很大，掉头撤退，落败溃逃。红三团紧追不舍，在玉桥、团庄区域又俘敌180多人。（据《多彩西吉》）

中共北方局和陕北特委派员来宁建党（中）

（一）团结进步师生，发展党的组织

宁夏建省后，将原甘肅省立第五中学改为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将原甘肅省立第八师范改为宁夏省立第一师范（即后期师范班），两校同址，统一管理。当时，宁中学校长思想保守落后，任用了一些复古守旧的老先生，学校师资水平低下。一些有识之士不断聘请外地有水平的教师到宁中任教。早在1930年初，北京大学毕业生杜立亭留留学生会推荐来宁中任教，并代理教务主任。9月杜立亭又介绍自己的同乡、同学，原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共产党员杜润芝到宁中任伦理学教员。

杜润芝很快就掌握了学生的思想动态，摸清了应该依靠的力量，将一大批进步学生如孙殿才（中宁人）、李天才（中宁人）、梁大均（青铜峡人）、李振邦、李广成、潘钟林（又名潘仲林，中卫人）、征克非、张琪、叶松龄、贺文绍等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随后，宁中又来了郭逸民、马汉文、赵子元等中共党员，他们思想进步、文化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又能结合教学传播革命思想，倡导学术、言论自由，启发学生提高思想觉悟，深受学生爱戴和崇敬。此时，中共陕北特委又派张德生来宁和杜润芝联系，推动了党在宁夏的工作。

（二）宁夏中学新潮

宁夏中学是当时宁夏的最高学府。广大师生又受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的熏陶，富有革命传统；加之宁夏地区军阀连年混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广大革命师生对现实极度不满。在杜润芝等共产党员的影响、教育下，革命热情高涨，革命风潮也在酝酿之中。

1930年秋，宁夏县县长刘端甫和宁中学校长徐宗儒不按时给后期师范班学生发放津贴，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在革

命教师的积极支持下，学生杨生连等人带头，多次质问刘端甫和徐宗儒。校方不仅不解决问题，还将杨生连以“带头闹事”“违反校规”“犯上作乱”等罪名开除学籍。在进步师生的支持下，杨生连将学校开除他学籍的牌子砸烂。对上述事端，进步学生和落后学生认识不一，发生争执，以至毆斗。党组织认为学生应团结一致，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学校和国民党当局。因而，杜润芝秘密指示孙殿才、梁大均、李天才等进步学生，公开提出“驱逐绅士校长徐宗儒”“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的口号。这些口号得到了大部分师生的支持，最后形成罢课。各班学生召开演讲会、张贴标语，学校当局向省政府代主席马福寿报告了此事。

宁夏当局大批逮捕学生的反动行径，引起了进步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地下党组织趁此机会把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分子手里。因而，发动各班学生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抗议当局逮捕学生。党组织还发动师生串联被捕学生的家长、亲友，揭露学校的内幕，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反动当局的野蛮手段遭到公众的普遍谴责。

由于宁夏驻军庞杂，省主席马鸿宾自觉势单力薄，恐怕宁中学潮势态扩大会影响全局，动摇他在宁夏的统治，采取和解的政策，并令代主席马福寿出面解决。马福寿组织双方谈判，最后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将徐宗儒调离宁中，任命杜立亭为宁中的校长；释放全部被捕的学生。学校组织学生队伍，到警察局将被关押的学生迎接返校。这样，宁中学潮就以进步势力争得领导权，保护了革命力量，打击了反动势力而获得胜利。

原驻宁夏军阀马仲英，1929年被

吉鸿昌走后，于1930年夏趁中原混战之机，从山东泰安重返宁夏，企图重整旧部东山再起。马鸿宾妄图将其控制在身边，授予他教导大队队长的头衔。马仲英常借放鹰、打球为名，到宁中活动，想拉拢一批青年学生，以便扩大势力。教导大队教官高立仁将马仲英的意图告诉了杜立亭，杜立亭转告杜润芝。杜润芝也想借马仲英之力，利用宁夏驻军庞杂、矛盾甚多的机会，建立一支党控制的革命武装，让杜立亭多接触马仲英。杜润芝让梁大均、杨生连、张振东、张绍翎、高尚文等人进行串联，动员一批进步学生参加了马仲英的教导大队，欲图控制这支队伍为革命所用。杜润芝还派李天才到中卫县联络青年学生10多人及马仲英旧部在中卫的驻军，准备策应。此时，西北地区连年大旱，军阀混战，兵匪到处抢劫，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人民灾难深重。马仲英借此机会提出“打倒贪官、为民除害”的口号，并打出了“三行省苛政猛虎，七枪杆伐罪吊民”的旗帜，颇具号召力，因而，聚集了一批走投无路的青年学生和破产失业的青壮年农民，准备暴动。

1930年冬，马鸿宾发现马仲英与宁中学生联合，准备“谋反”，即策划进行镇压。马仲英得悉，则率先揭竿，将教导大队拉出银川，直奔中卫，约合中卫准备策应人员1000多人，自称陕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经张掖进入新疆。

马鸿宾对杜立亭、杜润芝等教员先支持学生闹事、后支持马仲英“叛逃”的行为不满，确认“他们是共产党员，在宁夏中学搞赤化教育”。由于证据尚不明确，不便轻举妄动，但是却加紧了对宁夏中学的监视和检查。不久，因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一科长拆阅了安边小学教员王新三给杜润芝的信，国民党宁夏当局以“和共

产党有来往信件”为名，将杜立亭、杜润芝逮捕关押；将外地在宁夏中学的进步教师，有的解聘、有的驱逐出境。赵子元、马汉文被解聘并限期离宁。郭逸民因难以立足，离宁赴兰州。刘梅村继续留宁。马鸿宾派军法处处长多次到宁中清查共产党，致使宁中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杜立亭后来经他的老师、杨虎城将军的高参杜斌丞来电营救，保释出狱。杜润芝仍在狱中坚持斗争。次年，他们组织领导了银川小南门兵变和中宁护路队兵暴。

（三）银川小南门兵变和中宁护路队兵暴

1931年冬，宁夏地下党负责人杜润芝组织发动了银川小南门兵变和中宁护路队兵暴。这是宁夏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宁夏兵运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1931年春，梁大均、李天才随马仲英的教导大队到达酒泉，因军事失败而返回宁夏。当时，杜润芝仍在狱中，因无确凿证据，身份尚未暴露。由于杜润芝在宁中学生中有极高的声望，所以，得到看守所所长位春田和警察局科长王吉昌的同情和敬重，当时，行动还比较自由。梁大均、李天才回宁后，常以师生关系去探监、送食物。通过交谈，杜润芝得知全国和陕北不断爆发武装起义，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很好。他们还分析了宁夏的形势，认为宁夏是经过大革命影响的地区，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憎比较高，马氏家族盘踞甘宁两省，涂炭人民，不得人心。宁夏地方势力派及杂牌军和马氏家族各不隶属，矛盾尖锐……凡此种种，对革命是非常有利的。杜润芝指示李天才回中宁到地方部队参军，伺机策动兵变。指示梁大均等人做马鸿宾部队和其他杂牌军的策反工作，到时举行兵变。

（据《中共宁夏党史简明教程》）

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斗争

从1936年年底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边区境内仍有土匪48股，计4000余人，2000多支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边区境内冒出了多股土匪，这些土匪不时杀害干部群众、抢劫财物、袭击中共中央机关，严重影响了延安的安全。

随着对日作战的不断深入，日伪开始大批收买土匪武装充当奸细，打入边区刺探情报；国民党顽固派也千方百计地利用土匪破坏陕甘宁边区的治安。一部分土匪不再是单纯地抢劫财物，而是有目的地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政权。对此，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兵团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的指示。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严厉镇压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的活动，彻底消灭扰乱社会治安之日本别动队——土匪，巩固后方。”留守兵团开始对辖区内土匪进行军事围剿。毛泽东曾在给中共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刘景范和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黎林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根据剿匪经验，基本方针应该是：积极以军事力量打击土匪威胁，同时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分化、改造、改编、瓦解的策略，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

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可以自慰的，是两年以来在剿匪方面，我们消灭了大小四十多股，被我们击毙击伤的有800人左右，俘虏的有400人左右，缴枪1000多支。现在我们可以说，边区内部的土匪基本上已告肃清了。这不能不说是是一件伟大的胜利。”1939年冬，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土匪活动的高潮期。为巩固保卫边区，留守部队再度重拳出击，对由国民党顽固派支持的“政治土匪”，一方面大力清剿，一方面发出通电，对其予以揭露。

1939年冬起至1943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剿匪部队的围追堵截下，大部分“政治土匪”或被击溃，或逃离边区，或被彻底消灭，一些人数较多的土匪被留守部队坚决镇压。到1943年1月，边区政府彻底肃清了匪患。这场前后6年的剿匪斗争，既维护了边区的社会稳定，又为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剿匪战斗积累了宝贵经验。（据《人民政协报》）

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工作开展的基础，党依靠基层党组织才能把党的主张、政策和决议贯彻到群众中去，才能把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因此，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延安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态

1939年6月，边区党委发出《关于改进支部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建立支部的经常会议生活、工作制度，改变支部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及组织形式”，要“克服支部工作的被动性，应有经常的工作计划、具体分工及工作检查”，“各种会议按期召集，讨论各种具体工作，但会议不宜过多，并必须事先有充分准备。”并且，“今后支部工作的改进，最主要的应使支部能有单独的工作能力，使支部生活能真正活跃起来，能真正成为领导群众的核心，能够切实注意和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把所有的群众围绕在支部的周围，保证各种任务的顺利完成。”1940年1月，边区党委发出《关于乡村各种组织的规定》，关于基层党支部规定：一般的规定七人至九人的应设支部委员会，特殊情况者可由五人组织之；支部委员会下设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政府工作干事、军事干事、锄奸干事、工运干事、青运干事、妇运干事。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态，为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意识

能否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检验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试金石。中共中央曾指出：“一切不了解群众不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党部与党员，都不是好的党部与党员。”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也指出：“只有党与群众密切地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基层党组织要想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就必须“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支部的经常议事日程”。为此，1939年9月，边区党委组织部发出《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指出：“支部要真正地能够注意群众日常的大小问题，并给予适当的处理和解决，克服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的现象，在群众中建立信仰，使支部真正成为领导群众的核心。”同年十月，边区党委组织部再次强调指出：“彻底纠正支部脱离群众的、简单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切实注意民主，倾听群众意见，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保证支部与群众间的密切的联系。”

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党的工作开展的基础。1939年6月，边区党委发出《关于改进支部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对于党员的模范作用，应有正确的了解，每个党员在各种工作中应表现出高度的先锋积极作用，这些先锋的作用必须是出于党员的自觉与自动，而不是组织的分配与强迫。”同时，还要注意“创造模范支部和模范小组，务使模范支部及小组在各方面真正能成为模范，而不是名义上的，并以模范支部的经验教训以推动整个支部工作的改进。”为了推动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边区党委非常重视发现和创造模范基层支部，并不断总结模范基层支部工作的经验并推广之。1939年10月，边区党委组织部在报告中指出：由于支部“能注意解决群众的问题，密切了支部与群众的关系”，“极大多数的党员干部在执行各种任务与日常工作中能在群众中起他的先进战士的模范作用，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如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的好义沟村共有党员16名，编为3个小组，在1943年的春耕运动中，“春耕中应完成的任务，大都完成并超过计划”。原因在于支部起了积极的组织、协调和带头作用，由村支书、组织干事担任总领导，担负督促责任，小组长每隔5天检查一次，10天左右召开一次小组会通报情况，根据党员的能力高低分别负责帮助4户至5户或1户至2户群众。华池白马区四乡党支部的支书李占奎，工作积极认真，热心深入群众为群众解决困难，能够带领党员在开荒、秋收等各项工作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以此动员全乡群众积极完成各项任务，从而成为模范支部。（据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宁安堡南洋行踏营始末（二）

不多时，苏部从城北角的梯子上城来，用机枪扫射，守城军民纷纷逃下城墙，跑不及的多被打死或打伤。治成章部伤亡惨重，只好放弃西洋行，集中兵力固守南洋行。苏雨生本是土匪出身，烧杀抢掠成性。部队入城后，大开杀戒，未能跑脱的30余名护路队员和护城农民遭到屠戮，街头巷尾，惨不忍睹，尸体无人收敛，群狗饿猪争相撕食。苏部抢劫、搜杀等暴行三日不息，无论商号还是百姓，无论啥抢啥，由于看病医伤等原因，全城商号只有卖药兼看病的“忠仪长”没有被抢。

面对此种境况，马鸿宾令从黄渠桥追赶马大牛、杨猴小子（大名杨耀峰，当时归绥一带土匪，因人长得瘦小，百姓称杨猴小子）匪部至枣园堡的特务营，从广武过河，连夜赶赴宁安堡，援救被苏部围困在南洋行中的治成章部。鸡叫时分部队到达恩和堡。营长杨富荣令部队稍作休整，疲惫至极的士兵就势

一躺，睡在恩和街上。为了摸清宁安堡情况，杨营长又让手下找来两个老百姓询问战时情况并做向导，了解情况后杨营长让向导将队伍带往宁安堡，配合护路队与苏雨生部交战，解救治成章部。

7月22日，马鸿宾令恩和护路大队队长张自箴率队救援治成章。张自箴以自己人地两熟、行动便利的条件，率当地六七十名护路队员于当天下午抢回洼路王麻子寨子，第二天天亮又夺取了郭家庄，下午又打通了通往南洋行的路线和治成章部接头。鸣沙护路分队孙队长在南河边攻打陈家油坊时中弹身亡，副队长杨文才接替孙职，继续与苏雨生部作战，战斗异常激烈。第三天，恩和护路分队队长胡彦景率部攻占东门外吴安的寨子，治部之围遂解。张自箴驻魏家寨，胡彦景驻郭家寨。苏雨生部反被逼入城内，围困月余未能突围。由于草尽根绝，苏部便轻举妄动，但是却加紧了对宁夏中学的监视和检查。不久，因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一科长拆阅了安边小学教员王新三给杜润芝的信，国民党宁夏当局以“和共

员沙耀辰到宁安堡调解，治部撤回，苏部赴陕。此役苏雨生部损失惨重，剩余不足千人，于1930年9月13日离开宁安堡，向陕西转移。

在这次战役中，张自箴立了首功。由于他对当地情况熟悉，作战安排周密，跟特务营配合较好，才使治部很快突围。马鸿宾在庆功会上说张自箴有“文武才”。治成章也说：“没有张自箴，我的老命早完了。”

此役后，特务营移驻中宁。一连、二连驻南洋行，三连驻西门，四连驻老爷庙（今红宝商贸中心）。一连连长梁生海（外号梁疯子）二连连长马占荣（彰恩堡人，后改名马光荣），三连连长马明才（宝丰人），四连连长孙天才（枣园堡人）。

同年冬，马鸿宾率领22师留陕部队，在出潼关对蒋介石部队作战时失利，遂由马玉麟、马显诚率队返回宁夏，分驻各县，后马鸿宾将各县护路队编入正规军。（据《中宁文史资料》）